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教师心理福利场的意义建构

康翠萍,黄 鸿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教育治理目标的价值诉求。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心理经验的总和,教师心理福利场的特征与形态都可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在教育场域它以接受力和发射力驱动场域内事物的生发变化、繁荣衰减,并以合力方式对教师自身及与之交互的教育客体产生作用。从功能属性来考察,作为“吸引子”的教师心理福利场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一是打破信息和情感的茧房,缩短文化心理距离;二是催化社会交流认知,增加“锚定”和“物化”的概率;三是焕活文化逻辑起点再认,激发集体潜意识的外显。研究认为,探索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建构路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认同、认知认同、价值认同具有极其深刻的意蕴。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师心理福利场;作用机制;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24)04-0001-14

作者康翠萍,女,汉族,湖北省仙桃市人,教育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黄鸿,女,土家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博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湖北 恩施 445000)。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意志和依循原则。随着时间流转和空间实践的不断明确,人们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价值情感上的认同是激活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

* 本文为2022年湖北民族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心理福利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优化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项3)阶段性成果。

通过教育场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本质性功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下,教师如何通过“民族性觉知”触点产生角色力,从而影响和促进铸牢工作的实施,需要从治理视角切入,探讨作为教育治理主体——教师的心理福利场及其意义建构问题,这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内涵、特征与形态

自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928年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非经济福利”以来,“心理福利”这一概念就被运用到不同学科,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与拓展。社会学视角的“心理福利”,被解释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幸福和正常存在状态^①,这一诠释侧重个体主观感受,主要指向个体在社会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心理学意义上而言,心理福利是指以个体内在需求为旨要的精神供给。比如,有学者认为心理福利是个体对有意义环境的总体评价,主要涉及人在精神领域的幸福和利益^②,表现为个体对内外部环境评价基础上的行为反馈^③。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心理福利影响并协调个体对社会观念、文化意识等的认知与归属,是对自己所处群体、所存身份的觉知并以此建构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言“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④,心理福利则能动地赋予这个网特殊的属性,让个体在自我觉知的基础上获得了身份的认同与满足,并基于身份的识别生成相应类别形态、能量程度的心理势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心理福利就是教师心理需求的系统性满足及其生发的行为动力。

从物理学视角来理解教师心理福利场则更为直接。物理学有一种普遍的能量被称为“力”,它既可以改变自身性质结构又可以推动其他事物发展变化。这种被称为“力”的能量具有“发射力”与“接收力”两种作用方式,前者指事物通过发射自己的能量影响其他事物,而后者指事物接收来自周围事物的能量影响并随之作出内部反应和

① 杭行、刘伟亭:《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层次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 范为桥:《心理福利的结构研究》,《应用心理学》1999年第2期。

③ 范为桥:《心理福利:人类幸福的新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自序”,第2页。

④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结构调整。^①“力”正是以此状态存在并以立体的方式向内向外作用,这种力量系统便构成了一个“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力”形具了“场”,“场”让“力”合聚、纵深,边界弥散、广域辐射、持续发力。在学术界,有学者将物理学上的“场”引用到心理学领域,比如,“心理场”就被定义为生活空间——个体心理经验的总和^②。同样,教师心理福利场作为“心理场”,可以说就是一种心理经验的总和,是教师在与环境交互时对其心理及行为产生影响的事实。只不过这一“场”的形成是以心理福利作为驱动存在于教师行为表象之后,多维立体地影响其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一般来说,教师心理福利场以接受力和发射力驱动教育场域内事物的生发变化、繁荣衰减,并且以合力方式对教师自身及与之交互的教育客体产生作用。一方面,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力量受外界事物影响,比如教师内在精神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教师角色与社会身份的觉知是否平衡等影响“场”的形塑和“力”的表达;另一方面,心理福利场通过教师这一角色发射能量,引起教育场元素的调整与重组,比如教师的行为性评价及其生发的教育驱动力、协调力影响教育对象的认知评价、观念、行为。

如上论及,教师心理福利场作为“力”的一种现实形态,与物理“力”一样具有大小、方向和作用点等矢量特征并遵循平行四边形的合成法则,也就形成了教师心理福利场力,其“场力”之大小取决于福利需求的弥合程度。具体来说,当施与方式契合教师所需,速率和量度与个体特性匹配良好时,“场力”集聚生发,对内协调心理次序与状态、储备驱力,对外则增加交互意愿,生发教育势能,付诸有效教育实践。但若施与方式不能契合教师所需,则向内既不能心态自洽,向外又无法驱动行为,或者“场力”疲软耗散过快则无法产生质变。因此,教师心理福利场在大小特征上指向场内蕴涵的能量以及这些能量释放的程度。

从功能属性上讲,教师心理福利场力的作用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体现正反两种驱力,而且在实践中相背而行。正向上,教师个体基于文化需要、伦理满足、群体接纳和心理慰藉等系统性心理福利而主动求索,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量上的累积,主要表征为“力己”,也就是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寻求内在需要满足上的持续精进;而反向上,则形具了发散之力,是心理福利弥合后“力”的应用转化、实践反馈,在此方向上表现为

① 郑希付:《心理场理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竺培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力他”和“力群”，“力他”表征为微观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共情共享，“力群”表征为宏观上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传承赓续、革故鼎新。教师心理福利场是从无到有的零和博弈，“力他”与“力群”取决于“力己”的水平量度。

通过对教师心理福利场大小和方向的特征诠释,可以发现场力的作用点在于“福利需求弥合”这个关键点上,只有“场”主体教师的主观需求在不同层级依次得到心理福利系统性的反馈,“场”才能形具“力”的方向,控制“力”的大小,实现“力”的表征与实践。而且,以“福利需求弥合”这个作用点矢量特征为中心链接大小与方向,使之形成了“场力”的生发与耗散、平衡与博弈的平行四边形状态,建构了应然和实然的实践逻辑闭环。

那么,从形态上看,“场”蕴含着发射力和接收力两种作用形态^①,考究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形塑过程,采用社会表征理论的“锚定”与“物化”^②两个概念来解构场力的形态。社会学上,“锚定”就是文化同化,是外来社会表征通过交往交流有机融入原有社会表征并形成新的社会表征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将陌生的观念整合进既有观念中,成为社会参照体系一部分的过程。这与“场”接收“力”的内涵是一致的。“物化”则反之,是对理性进行感性具化,用社会参照体系的叙事形式赋予抽象概念具体意义的过程,“物化”与“场”的发射力具有同样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教师心理福利场力的形态解构置于民族教育工作中,则有了更直观的表达。比如,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认为群体思想和情感集合的“锚定”与“物化”一般是通过人的口头交流和外显行为表现的^③。因此,教师心理福利场力的形态可解析为教师在与教育客体交互中,通过“锚定”和“物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社会共识和集体情感的认同。从实践层面分析,教师心理福利场以接受力即“锚定”这个形态,让民族特色整合进“共族”——中华民族的民族底色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范域以其包容性和整合性让新旧、独特与共有产生质的联结而有了“共族”的内涵与外延;教师心理福利场以发射力即以“物化”形态,赋予抽象的概念和模糊的

① 郑希付:《心理场理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管健、乐国安:《社会表征理论及其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③ Höijer B.,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A New Theory for Media Research", *Nordicom Review*, vol. 32, no. 2, 2011.

情感以具象的外衣,让其感知性增强,形象更饱满生动,因脱离了说教和灌输而具有了内在民族认同潜化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教师心理福利场力的形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展演。

二、教师心理福利场的核心机理:“吸引子”

“吸引子”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系统朝某个稳态发展的趋势^①。根据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内涵和外延,以“吸引子”作为场的核心元素是指心理福利场在协调教师心理系统平稳和驱动行为选择时,此场之“力”就将教师拉向或固置在积极的心理状态、情感意识、信念意志维度上。根据场力的结构理论^②,教师心理福利场的结构包含有主导吸引子、辅助吸引子和异构吸引子。其中,主导吸引子是指激活教育群及教育个体深层认知与意志,催动教师进行知、情、意、行的调试和装备,促发心理福利场力势能的吸引子;辅助吸引子是指与场形塑的内在价值观念相近或相似的吸引子,它以外蓄之力契合福利所需,产生驱力;而异构吸引子则是指与场属性与特征相排斥的吸引子,会从反方向耗散场力,使其衰减。在教师心理福利场中,各类吸引子均会对教师产生吸引力,力图把其拉向不同吸引子的范畴内,这种吸力或拉力合成为教师心理福利场力。因此,若以此结构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那么,场的主导吸引子如民族集体潜意识等可以将主体导向民族共同情感的激活,辅助吸引子如交往交流频率增加等可以将主体导向共同文化的认知,而异构吸引子如文化心理距离等则反向让人和群产生分别,降低互纳互融互认度。

综上不难看出,场力是各个吸引子“力”的矢量和,它遵循平行四边形的合成法则使“力”量化。而在教师心理福利场中,三类吸引子均对教师施加力,但因每类吸引子作用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不同,最后的合力并不取决于任何一类吸引子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而是各类吸引子力合聚的结果。如图1所示:

① 郝柏林:《分岔、混沌、奇怪吸引子、湍流及其它——关于确定论系统中的内在随机性》,《物理学进展》1983年第3期。

② 莫飞平:《德育场力及其整合与优化机制探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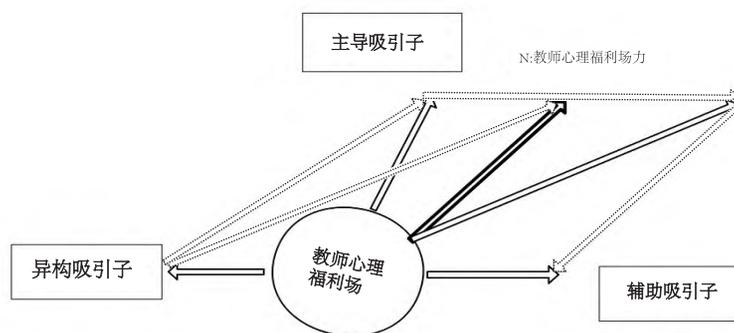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心理福利场结构图

注:N所代表的教师心理福利场力的数值由主导吸引子、辅助吸引子、异构吸引子合力组成,且是一个平行四边形角力结构。

(一) 异构吸引子的教师心理福利场打破信息和情感茧房,缩短文化心理距离

文化心理距离就是场的异构吸引子。基于物理表征衍生的文化心理距离影响信息的融通和情感的互纳,表现为信息的封闭和情绪的收紧。因距离生发茧房,会导致沟通迟滞,情感疏远。通常情况下,这种异构吸引子会引致场力的无序和耗散。

从学理上讲,除“我”“他”的区别外,民族还有更上位的概念——“共族”。中华民族之于各民族便是“共族”。一般而言,识别、理解和认同“共族”需要民族信息的流通和民族情感的扩容,而这又取决于二者的开放程度。若心理福利施与过分偏向个性考究与个体需求,采取重“我”轻“共”的价值观照,这种心理福利会导致“他群”“共族”产生分界,扩大彼此间文化心理距离。而距离扩大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信息封闭和情感阻遏,由此形成的心理福利场会吸引教师维持在唯个性而轻群性的维度上,在教育实践中忽略对他者的关注,排斥对共群的趋近与认同。基于单一文化价值取向形成的异构吸引子会引起“场”结构的紊乱和“力”的耗散。对“共族”的认知异议也会影响或消减教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但如果福利供给兼顾了“我”与“共”的双重价值因素,心理福利场则会降低异构吸引子的干扰影响。在此情况下,它不仅赋予教师双重文化的观照自省,还赋能其对“共族”文化识别、理解、接纳的能力,最终能破除封闭的茧房,增加民族信息交流频率和幅度,产生新的民族情感联结,因情感通贯在意识层面进一步消减文化阻隔,缩短文化心理距离,使族群间、族与“共族”之间的心理融近,萌芽“共族”意识。在教育实践中,“场”不仅缩短了教师主体的文化心理距离,而且因为“场力”的扩散和助推,使教师主体在互动中引发了对“共

族”文化的识别和情感的再认。

总之,教师心理福利场赋能教师在获取福利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的意志力,在文化互认互感过程中排解融通之困难,构筑新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民族情感形塑方式,消弭了边界,促进了共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福利需求与民族文化精神共振是消减异构吸引子无序影响的关键之所在。

(二) 辅助吸引子的教师心理福利场催化社会交流与认知,增加“锚定”和“物化”概率

这里所谓的“锚定”是一个汉语词汇,含义是用锚定桩锚住或稳定住。作为一个概念使用时,它是行为经济学范畴的一个术语,指人们趋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过去已有的估计相联系。具体而言,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答案的特性。“锚定”的基础是社会参照体系的标记尺度。众所周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文化是社会参照体系的标尺,若文化间界限分明,封闭互斥,则锚定的空间窄、能力弱、概率低;若文化间彼此接纳、互通互容,则丰富的内蕴让锚定有更广的空间、更高的概率。与“锚定”相对应的“物化”是提取意识的具化措施,“物化”在开放的文化认知基础上可以让宏大的命题和语义脱离陌生遥远,以普通大众熟悉的方式表征于不同对象,以此将抽象概念传送抵达到个体认知内部,形成鲜活意识。反之,开放程度低的文化域内物化容易失败。因此,可以说,“锚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过程,“物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象展演。

无疑,教师心理福利场可以导引出个体被尊重和被满足的状态,接洽更开放、接纳和包容的心理,以此形成兼具主动认知的内隐力。这种“内隐力”因其源发的性质提升了各个体交往交流的意愿,也在交往交流频次增加的基础上衍生互通互感的情绪,从而可以创生对“他群”文化包容接纳和认知理解的能力。因此,这从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社会参照体系更丰富的标记尺度,更广域的认知范畴,增加了“锚定”和“物化”的概率。当然,基于主动交往交流意愿的“锚定”和“物化”,其联结和嵌入的过程不再是单向的输入输出,而是双向的贯通互认,是在知、情、意、行等维度上的主动作为和自然协

调。从这个意义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不再是被动僵化的,相反它对冲了陌生与犹豫,消减了抵触和疲乏,也对接下来的民族文化逻辑起点再认奠定了基础,有了良好的准备。

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中,心理福利场使教师与其他教育客体或教育参与者的互动有了依循的路径。比如,以教师为中心展开的教育交互如课堂教学、实践指导、讲座交流、教学研讨、备课磨课等,不仅增强了认知交流的意愿、焕活了情绪,而且还会因主动寻求认知交流策略的更新升级而增强了“锚定”和“物化”的效能。同时,基于“锚定”和“物化”自然顺畅的纳入,认知策略的转变革新不仅引起了场力的结构和形态变化,“锚定”和“物化”概率的循环增加,还能够将更多教育主客体引入场中,形成新的交往交流交融圈层,循环往复。此外,“锚定”和“物化”概率的增强不仅让教师具备了内生动力,还使其在信息和情感融贯中具有了意志力,以坚韧和耐心抵抗差异和区别带来的退缩,消减互认互感中的不畅,持续生力以建构社会交流认知生态的活性。这可谓心理福利场赋予教师的关键能力,并使之具备了生发性和恒久力。

(三)主导吸引子的教师心理福利场焕活文化逻辑起点再认,激发集体潜意识外显

以功能而论,文化是族际的划分维度,亦是民族融合的根基。我们知道,民族文化的逻辑起点源于文字、语言和习俗。三者之间,因文字和语言的差异产生不同习俗,形成文化藩篱的区别标准。但从历史纵深看,文化虽然在语言和文字上存在显性差异,但二者要表达的意义和传递的信念则是同脉而行的,比如,《格萨尔》《玛纳斯》的语言和文字极具民族特色,但在内核上与中华民族文明的价值内核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对于文化逻辑起点的再认是消除文化藩篱的有效切入口,将文化起点前移或前置,在形式之外侧重考究文化的内核意蕴,有利于对“共族”的文化互认和情绪互感。

当然,文化逻辑起点的再认需要认知牵引,这不仅关涉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接纳理解的意愿,认知主体挖掘和诠释文化的能力和意志也至关重要。而辅助吸引子促发了“锚定”和“物化”概率的圈层性叠加,这使得教师内生出能挖掘文化内核与根源的动力和情感。因此,教师心理福利场不仅保障了其主动探索的节奏和深度,还消减了文化逻

辑起点再认后与他文化链接组构时的阻力,此时教师往往会以协调者的角色平衡文化图式的互嵌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寻根溯源和民族心理深度挖掘是同向而行的,在文化上发现同根同源的事实,在心理上焕活同宗同族的意识,双向促发和激活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唤醒民族记忆,凝聚民族情感,从而可以重建民族身份。

从更深意义上讲,对文化逻辑起点的再认是意识“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而教师正是基于心理福利场能在教育交互中实现“自觉”向“自为”的升级。具体而言,文化再认形塑了教师更精准、更富有深度的表达和展演力,让教育客体也感知并思考,尝试理解和模仿教师,而对思考方式、行为表达的模仿则会让客体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探寻文化之根源,并尝试将其纳入新的文化图式中,这个过程具有自我观测性和自我整合性,这正是文化逻辑起点再认在客体间的存在样态。

因此,在实践中教师利用教育主客体间的文化互动,将起发于教师民族性觉知基础上的民族情感凝练乃至纵深,基于此展演集体潜意识里的民族情感,是激活民族情感从亲缘性向地缘性、再向价值意识缘转向的过程,是族际情感向共族情感迭变的趋向,是情绪共情向情感共情、价值共情的演化。

综上分析可知,教师心理福利场的主辅吸引子能重塑民族认知、焕活民族心理、平衡文化图式、丰富文化参照,因“场”的作用,不仅增强了教育过程中主客体交往交流交融的频率,还促发教师从“民族自在”“民族自觉”向“民族自为”进阶,继而通过教育交互在民族认同工作中以张力、拉力、推力、引力辐射影响,推己及人、推己及群。而异构吸引子则在相反的方向导致文化的单维和场力的衰减,但平衡后因内在文化观照让教师具备了对抗紊乱和无序的动能。教师心理福利场的三种“吸引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域中因其民族认知观、民族情感观、民族实践观、民族价值观以力抗力、以力引力、以力推力,最终形成合力。由此可见,教师心理福利场的三种“吸引子”在“力”的博弈中平衡互构、续力无穷、生成价值。

三、教师心理福利场的深层蕴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前所论,“场”之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负熵的过程,是创生和加强有序吸引子的过程,也是削减与抵消异构吸引子的结合过程。同理,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建构不仅

是“场力”表达的路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意义的阐释载体。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构教师心理福利场,通过完善保障机制、拓展建设维度、把准实践原则,才能增强精神认同、认知认同、价值认同,最终才能从中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意蕴。

(一) 完善教师心理福利保障机制,激活民族图腾以增强精神认同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图腾是社会的“徽志”,它不仅划定自身族群与他者的区别,还促成了族群内的认同。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也认为,图腾能维系氏族团结^①,并以精神认同的方式增强民族认同的内聚力。比如,龙、竹等动植物作为原始民族图腾,就赋予了族群精神信仰和族际边界。但随着人类的理性发展,动植物图腾崇拜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为锚点的精神崇拜,而以语言、文字、习俗为表征的文化成为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被具象化为精神图腾。心理福利场激发教师及其交互客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接纳理解的意愿再认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点,以坚定的意志与卓然的能力去挖掘和诠释中华民族的内核。因此,教师心理福利场焕活了文化逻辑起点再认,激活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赋能了以中华民族为精神范域的对民族文化依归的追溯。在探寻文化基因的过程中互通容纳,挖掘了民族精神图腾的内涵和表征,扩容了民族文化的体量,强化了对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理解认知,进而在精神认同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深层地理解,教师心理福利场负熵的途径是保障机制的完善有序,是信息共通、情绪共感、认知共容的基础,是文化逻辑起点再认和集体潜意识激活的关键。因此,只有完善保障机制并动态性弥合需求,教师心理福利场的结构才能稳定,使之发挥场力激活集体潜意识,再认文化精神图腾,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认同。

具体来说,一要构建多维立体、圈层辐射的教师心理福利保障机制。社会、政府、高校、个体合力协同,从教师心理福利目标、福利管理、福利制度、福利人员、福利资金和福利设施等方面建立清晰明确的保障体系。以提高对心理福利的觉知为前提,协调

^① 方清云:《少数民族图腾文化重构与启示——对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人类学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运行管理,“配伍”专兼结合工作队伍,加强心理福利调研、排查、干预、反馈等功能建设,通过拓宽福利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建设标准化福利设施,为教师提供规范专业的心理福利援助和保健。

二要依据福利需求和实践旨要协调流程、优化举措。根据场域理论,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建构可从“入场”“在场”“出场”三个阶段展开,其中“入场”阶段,注重分析教师心理福利的需求品类、福利量度、供应渠道、施放措施等基源性因素,关注福利策略供给的矢点和指针,重点置于实施细节和步骤;“在场”阶段,注重因时而易、因人而易、因域而易地调整心理福利操作结构和实施方式,关注福利策略的效能回应和结果反馈,重点置于过程观察和实践检视,要关注心理福利是否产生了量化积累,是否发生了质化跃升,使心理福利由表浅到纵深,在民族性觉知的基础上产生价值传导和启发;“出场”阶段,注重教师心理福利的补充和续能,关注心理力的可持续发展,重点置于福利的衔接和转换。此处的“出场”并非福利本体的离退,而是心理福利策略随着情势变化更新重组。因此,一般要基于前期供应特点状态确保福利离场而力不断续,通过其他手段维系心理场力的结构稳定和水平保持。

(二) 丰富教师心理福利建设维度,组构民族图式增强认知认同

康德(Immanuel Kant)最早提出“图式”概念,认为它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手段;皮亚杰(Jean Piaget)强调认知源于主客体间的互动,而互动诱发的自我调节使客体同化到主体的图式中;应用语言学家库克(Guy Cook)则指出,图式是头脑中的“先存知识”,它是将新信息和已知信息联系起来的呈现方式。^①由此,我们认为,民族图式可理解为持续发生作用的民族认知框架,通过主客体互动以“物化”连接表征与概念,以“锚定”整合新旧信息,并在主客体认同、借鉴、自觉的动态中取得图式的扩容和平衡。建构教师心理福利场,就是要通过催化社会交流增加民族文化“锚定”和“物化”的概率,促进主、客体民族图式参照体系的扩大,具化民族抽象概念和意识。在此情况下,民族图式则变成一种开放的系统,一方面主体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丰富图式容量,另一方面客体因为图式张力获取民族认知力量,将原有认知整合进主体民族图式当中。因此,建构

^① 王宏、曹灵美:《图式理论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教师心理福利场,可以通过主客体教育交互组构民族图式,且以此图式所开展的认知会进一步凝聚认同意识,这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交互性的表达所指向的是教师福利设计的主体间性。基于此,福利设计时应避免单维化,要考虑与教师进行互动的相关教育客体,关注主客体的互动方式和互动频率,从而丰富教师心理福利设计维度。首先,在教育教学互动中,关注教师与其对象的需求,重视教师对于互动程度和方式的要求,参考个性特质和心理表征设计福利量级和施与形式;其次,在教育管理互动中,关注互动环境、互动角色和互动渠道,以局域生态为旨要设计福利样态和表征方式。民族图式在主体认识中往往赋予主客体活性,形成特殊的互动文化,比如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民族觉知力和民族能动性的释放,就是民族图式的场主体内泵力自在、自觉、自为的动态发展。同时,教育场客体也在互动中被民族图式激活认知驱动力,扩大文化甄别、吸纳、整合的意愿和能力,基于“锚定”和“物化”焕活民族情感,生发民族信念和民族意志与精神。因此,教育教学活动中,民族图式的张力一般以教师为起点,催动教育客体的民族性觉知,实现民族自觉、自在和自为的进阶,同时,其又成为另一教育圈层上的锚定者和物化者,这种主客体间的循环往复重组了不断丰富的民族图式,以此为锚点不断增强教育主客体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认同。

(三) 把准教师心理福利实践原则,缩短文化心理距离增强价值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①。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教师心理福利场的重构,就是要把准“多元一体”原则,“多元”是样态,“一体”是基础;“多元”是渠道,“一体”是归向。唯此才能缩短文化心理距离,增加“锚定”和“物化”的概率,激活跨代际的集体潜意识的外显。这是教师心理福利场建构的实践原则,也是教育治理与民族工作同频共振的价值取向,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认同的重要方式。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具体来说,一要从认知维度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心理福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千篇一律的措施和陈旧脱序的理念,这是预防异构吸引子产生的前提。因为不同的教师个体,心理福利实施的时间、对象、途径、方法、态度、体量等都是有区别的,在具体操作中不仅要反复验证,还要观照个体内在觉知,真正以对象的需求为目的设定程序节奏和具体内容,才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二要从唯个性“多元”可能引发异构吸引子的干扰,尤其是在“教师心理福利”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维变量结合过程中,经验主义或片面主义都有可能造成二者角色和量度的失衡,要避免以心理福利场的建构为名造成特殊的唯个性的凸显。因此,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建构应坚持国家立场,不能落入只强调个性而不彰显共性的窠臼,否则与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内涵、特征与功能相背而驰。把准这一原则才符合国家战略意义,适切时代发展旨趣。

三要通过教师心理福利场的重构以避免唯物质化。一般来说,过分集中于外物供给和资源倾斜的心理福利是单向度的输送,不仅没有办法赋能,还会因为偏狭而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遵循内外统一、输送通达,输血、造血是同向而并行不悖的选择,是一体两面频率共振的要求。只有把握多元一体、以输引造的福利实践原则,才能平衡个性和群性、整合输入与输出、避免异构吸引子的无序、导引文化距离的缩小,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总之,将“场”的概念引入教育治理和教师治理实践,是价值理性的回归,是解决过分夸大内部因素而低估外部环境因素归因性偏差的关键。“心理场”以 $N = f(P, E)$ 的函数关系强调了个体行为选择不仅内指性格特点,还因环境刺激产生驱力的差异。而对教师心理福利场的研究将教师从固态中激活,以心理福利作为中介展演了教师教育动力性的迭变,这实际上是个体在面对不同外界环境刺激后内泵力变化传导的展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场域内,教师心理福利场的实践联动了教育客体,实现了环境刺激、认知价值和行为选择的多重循环,在循环网中创生了不同层级和类群的心理场、文化场、学习场,从而以精神认同、认知认同和价值认同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

[责任编辑:张莹 杨琼艳]

[责任校对:罗兴贵]

Meaningful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fare Fiel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ANG Cuiping, HUANG Hong

Abstract: Enhanc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a value pursuit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s a sum of mental experiences, the features and formations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fare field can be shown in the practice of enhanc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domain it drives the emergence, changes and ups and downs of things in terms of acceptance and launch forces, and exerts much impact on teachers themselves and the objects interacting with the former through synergy. By means of functional propert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fare field, as "attracting force", is mainly revealed in three ways: to break the cocoon house of information and emotions and reduce cultural and mental distance; to induce social interaction cognition an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anchoring and objectivizing; to reinvigorate the re-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logical starting-point and stimulate the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The study assumes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paths for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fare field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piritual, cognitive and value endorsement of enhanc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enhanc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fare field; impact mechanism;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